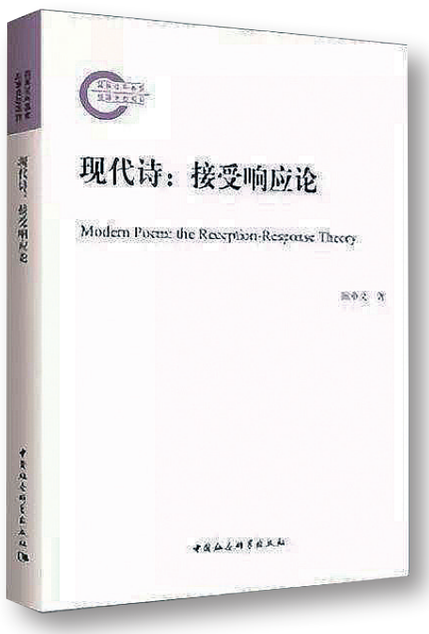
■第一阅读

建构现代诗接受研究的空间范式

——读陈仲义《现代诗：接受响应论》

□张凯成

在现代诗研究的版图中，陈仲义有其独特的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他在研究中所采用的独异路径所决定，另一方面则与他所坚持的“‘修远’与‘切实’，以及‘自若’”（沈奇语）的诗学精神紧密相连，其新著《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正从“诗歌接受研究”层面，诠释出了他的这种“独特”。从时间维度上看，该著与《现代诗：语言张力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对话”关系，宣告他为现代诗的研究确立了又一崭新“刻度”，并由此凸显了其在诗歌接受研究史上的重要位置。与此同时，陈仲义又创造出了现代诗接受研究的“共时场”，建构出了独异的“空间范式”，这集中体现在该著的研究思维、轴心与方法上。



研究思维的“接受化”

诗歌的接受问题本身属于“老问题”，它几乎伴随着诗歌的产生而出现。就现代诗而言，从它的生发之日起，有关现代诗的接受研究随即生成。到了今天，当我们再次触碰这一“老问题”时，该采用何种视点来进入对它的探究？是需要研究者所认真思考的问题。尽管目前学界出现了一些有关该问题的讨论，但这些讨论或因过多地依附于“接受美学”的理论框架，或因一味地凸显“接受”的地位而排斥“作者”“文本”等视域，因此并未达到研究的“理想状态”。换言之，这些讨论仅仅将关注点放在确立接受研究的“形式”上，尚未触及研究的“本体”。此种境况下，《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正提供给我们一种有效的探察路径，这之中最为关键的是其所运用的“接受化”的研究思维。

笔者这里所说的“接受化”思维一方面是从研究内容上来谈的，该著以诗歌的“接受”为核心点，辐射出了经典化、版本学、修辞学等诸多面向，由此形成了复杂的“文本接受场”。尽管中外诗坛已出现过有关“诗歌接受”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比如布鲁姆《读诗的艺术》、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孙玉石的《中国现代诗导读》系列、陈超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等，但这些著作的立足点在于“解诗学”的建构，更多地着眼于对诗歌文本的分析，其本质上并未跳出“文本”的中心视域。《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则以诗歌文本的接受为基础，重点是对“接受”效力问题的探讨，以此呈现出了“接受化”的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这种“接受化”思维体现在该著对于西方的“接受美学”及其相关理论的“中国化”接受上。笔者看来，诗歌的“接受”理论更多地处于“西方”的维度之内，尽管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不少论述涉及“接受”，但这些论述较多地框囿于“诗歌鉴赏”“如何读诗”等功能性的范畴中。据此来看，《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表现出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它并非“以西方接受反应理论做亦步亦趋地移用”，而是“将其合理内核‘植入’研究过程，偏重‘拿来主义’视界下对本土经验的应用性跟进”。在此影响下，该著将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接受”部分与西方“接受”理论之间混融起来，而此种方式又内在地同构于现代诗自身的发展过程之中，并为其在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行性的借鉴。

接受研究“轴心”的把捉

笔者看来，诗歌接受研究更多地属于外部研究，研究者需跳出一般性的囿于诗学内部的思维方式，在涵括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的基础上，进而型构成某种“诗学结构体”。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一方面需要保持精敏的诗学意识——因为研究者需从诸多诗歌文本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来进行剖析与体察——另一方面则需要拥有开阔的研究视野，这集中体现在研究者对接受研究的两个轴心的把握上。具体而言，这里的轴心包括了历时性的接受纵轴（不同时期发生的诗歌“接受”现象）与共时性的接受横轴（同一时期、同一阶段诗歌“接受”现象的比较），《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正有效地把捉了此两种研究“轴心”。比如从“纵轴”上看，该著基本涵括了自新诗发生直至当下的现代诗接受现象，对新诗百年的接受历程进行了系统地爬梳与剖析。典型的如在“新诗接受的历史检视”章节中，作者的研究视域从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延展到“21世纪的网络诗歌”，他通过这种历史性的检视，在发掘新诗接受之曲折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化”的思维，以此反思了百年新诗的接受问题。此外，该著还有着对“横轴”的细致把捉，这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的接受问题及“汪国真”现象等的剖析上。根本上看，此种研究完全跳出了诗歌文本的阈限，其中融构的是对文化体制、政治政策、社会思潮等内容的思考。

在把握好诗歌接受研究轴心的前提下，《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把研究重点放置于对一幕幕鲜活史料的挖掘与分析中，这使其与史料研究之间建立了内在的同构性。整体上看，史料研究是诗歌研究界近些年来较为重视的研究方向。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一书尽管不是诗歌研究专著，但他所提供的“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着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的研究思维，正为诗歌史料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思考，而他近年来正逐步探索着以“随笔体”的形式来介入诗歌史料研究的可能性。与之相比，《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对于史料的挖掘与呈现趋于学理化，即这些史料的选择与剖析均围绕着“接受”的维度展开，这使其在呈现史料之诗学价值的同时，形成了以“接受”为中心的“联动机制”。

研究方法的综合性

除了上述两点外，《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的“空间范式”还体现在其所运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层面。该著非完全限制在“接受”的维度中，而是由前述的“接受化”思维出发，辐射、建构出了综合性的研究视域。这与陈仲义所意识到的“如何将文本的客观性与接受的主观性统一起来”的写作难点相互关联，因此，他并没有完全抛置诗歌文本，而是深入到了文本腹地，精准地捕捉到了“文本”与“接受”之间的奇妙关系。同时，该写作难点中还存在着“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内在悖论，而要克服这一悖论，则需要综合性研究方法的加入，以实现二者的联系与互动。正如该著看到的，“目前中国诗歌界的批评是以综合话语阐释为主流”，在此意义上，该著正与“综合话语阐释”——如钱理群的“大文学史”观、陈超的“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姜涛的“大诗学”观、张桃洲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相互穿越、渗透乃至包容”等——的主流研究方式，形成了深入的“对话”关系。

此外，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还使得陈仲义能够以主动的姿态对历史问题进行“现实化”的处理，其最终的指向是对现代诗未来发展的深刻关怀。在当前的研究中，诗歌研究较之诗歌现场的“滞后”现象普遍存在，但反过来说，一味地执著于对诗歌未来发展状况的指认，则无疑掺杂着强烈的主观臆测成分，而《现代诗：接受响应论》一书正有效地弥合了研究与现场之间的“时差”问题。也正是基于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该著对诗歌接受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身的期许，包括“走向文本接受的‘规范’”“永远处在追新求变的‘途中’”“文本自足性与接受开放性的统一”等。尽管陈仲义将之命名为“缪悠之测”，但这可以视为他在综合考察现代诗接受问题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可行性分析，因此其中包含更多的是一种可贵的“真”。

■书斋札记

东君作品的风骨与气质

□彭学明

初见东君，就觉得他是翩翩君子型的。有点柔弱，却很高冷，像一个瘦高的侠士，沉默、冷峻、孤傲。看似一吹就倒，却十级狂风也斜不了他半点，风起长衫却岿然不动的样子，活脱脱一个侠义书生，有一种天然的静气和定力。

文如其人，很多人是对不上号的。东君却对得上，文与人很搭。东君的作品，满纸都是这种静气和定力。那些文字，带着阳光、雨露和风，落在纸上时，立刻静了，只看见东君领着一个个人物悄无声息地在纸上穿行。领路的是一个君子，穿行的也是一群君子。无论富商还是穷人，无论官人还是百姓，无论僧人还是艺人，都灌注了君子之风。不管那些人物多么鲜活，生活多么生动，那种淡定、安宁却奇崛、傲然的君子气质，都无声无息地从文字的骨缝里飘出来，从卷头弥漫到卷尾。是东君给那些人物的言行和内心赋予了一种天然的宁静和淡泊，清心寡欲却有形、有致、有声、有色，还有力量和滋味。东君有一种像装了隔音玻璃一般的能力，把红尘和喧嚣隔离身外，满眼的风景依然看得见，喧嚣和嘈杂却没有了，一个纷繁的世界立马成了世外桃源，所以，再风起云涌的世界，我们看到的都是超然物外的人物和灵魂。在《听洪素手弹琴》里，东君用琴做楔子，让高雅的洪素手只以高山弹给流水的琴声，把所有物欲弹散弹灭，把所有波涛收于洪素手的心。

君子之风往往是与雅士之气连为一体的。

雅是东君作品第二个鲜明的特质。东君的文字是雅的，东君的叙述是雅的，东君作品里的人物也是雅的。东君的文字和叙述，透溢着文人气息、文化气息和文雅气息。就像一个雅士，一边端着热气腾腾的茶盏品茗，一边娓娓讲述局外的人事。爱恨情仇，刀光剑影，都在一刮一滑的茶盖里与茶香和热气轻轻飘出。东君在《子虚先生在乌有乡》中写李屠时，写他脸上有古树相，天生的种树的料。在《出尘记》里，写陶松的老爹对着老树说话，那棵快要枯死的老树居然被他说活过来了。儒雅的不仅仅是东君，更是东君笔下的人物。东君笔下的人物似乎说话做事都慧眼慧心，都很儒雅、体面，都有文化，讲尊严。《阿拙仙》里，梅溪三高是那样的相互尊重、相互取暖、惺惺相惜，把文人灵魂的雅致写到了极致。柳先生有财，家财万贯；朱先生有材，诗书画样样精通；三壶先生有才，各种材质在他手里都会变成艺术品。朱先生喝醉误睡了柳先生的棺材，柳先生就送与朱先生了。柳先生去世时，朱先生、三壶先生和阿拙为其办丧事和守灵。三壶的家被日本鬼子烧毁后穷困潦倒，朱先生经常送去粮食接济。酒和茶，是三人经常聚首时雅的物象，而情和意则是三人儒的本质。而《子虚先生在乌有乡》里，每一个和尚都那么仁者慧心，道法高妙，把黄叶都可当经看。而那些淳朴的村人，却淳朴得“好像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是同木叶一道从土里长出来的”。

东君以文字打通尘世，以文字接通人间，以文字照亮世俗。地气、灵气、人气，还有道义、情义、理义，息息相通，水乳交融。而悲悯，是这气和义里最大的底色。《子虚先生在乌有乡》是一篇关于心灵皈依和精神救赎的作品。房地产开发商姚子轩衣锦还乡，为乡亲大做善事，积善积德，却依然备感罪恶缠身，未能功德圆满。他归乡还乡，并把乡民都送进城里安置居住，以便自己过着一种不为名利所累的世外桃源生活，可是他看到一次又一次发财的机会时，又心生贪欲，结果把安静的乡村又建成了喧嚣的世界，把世外桃源的生活，变成了滚滚红尘。似乎什么都有了，却迷失了自己。似乎什么都没有了，却还剩下自己。人生何处是净土？心灵哪里是皈依？这是东君借姚碧轩之口的精神追问。《出尘记》是外公、舅舅、陶松三个乡村男人搭起的一台戏，东君借外公、舅舅、陶松之间错综复杂的命运纠葛，梳理人间世俗的乡村肌理。《阿拙仙》里，阿拙自幼无父母，却拙中藏智，跟着师傅三壶学得黄杨木雕的好手艺，娶了师傅的女儿含玉，生了一对双胞胎。日军侵略时，一个日本逃兵躲进阿拙家，妻子含玉和儿子惨遭杀害，女儿吓疯。几十年后，这个躲进阿拙家的日本兵来到中国面见阿拙，留下了一个匣子，又解开了一段含玉被杀的真相。这是东君借阿拙仙之命，对一个时代的指控。而《听洪素手弹琴》里，当古琴师洪素手坚决不肯屈就为老板弹琴，并一烟灰缸砸向企图伤害她的唐老板，与在师傅家做装修的民工小瞿夺门而去不知去向时，东君是在为一个有坚持和有骨气的小女子唱一曲离歌。

■品 鉴

心灵与自然有机契合

《我与大海——戴砚田散文选》：

□刘国震

正在筹备将在古城定州召开的河北省公安作协一届三次理事会之际，忽然接到老作家戴砚田先生的来信，告知我他的《我与大海——戴砚田散文选》已经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并嘱我作序。

获悉这个消息，我心中的欣喜与激动，不亚于自己的一部新著出版。

20世纪80年代初，我还在家乡读中学。一个美丽的夏夜，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一篇配乐散文，题为《岁久莲更香》，那优美的意境，深挚的情感，动人的旋律，以及女播音员那声情并茂的朗诵，深深地打动了我。此后，我又在河北省文联主办的《小荷》文学杂志看到了这篇作品荣获首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的消息，在南宫县新华书店里购买到一本创刊不久的《诗神》杂志，在著名诗人雁翼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抒情短诗选》里读到组诗《露珠集》，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海采珠——1985年新诗日历》中读到一首题为《自勉》的短诗，在《诗刊》1985年第8期读到一篇记述河北省“芒种诗会”的特写《拿出优秀作品来！》……从此，心中牢牢地记住了一个令我仰慕的名字：戴砚田。

1990年，我在军校学习时，得知《大众文艺》编辑部就在我们部队附近，便带了几首习作诗稿，不揣冒昧地前去拜访戴先生。初次见面，老诗人的热诚、谦逊、和善、质朴，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当我拿出自己的《蜘蛛》等习作求教时，戴老师认真审读后，高兴地说：“你的诗歌没有初学者那种散漫无序的毛病，写得凝练、集中，看得出已经有五六年的功夫了。以我近40年的编辑工作经验，可以判断，你一定能成！”他还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谈了一个文学青年应该怎样向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挺进，并谆谆告诫：“作家应该同时是思想家！”临别时，我拿出笔记本请先生题字留念，他不假思索，转瞬间，一段舒朗、大气、秀美的文字就从笔端流出：“战士的威武雄壮，青春的微笑低语，都在你心灵幻化的诗句之中，为我们祖国文坛添彩，就是幸福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位前辈作家。先生的教诲与鼓励，在我此后业余文学之旅的漫长跋涉中所起的励志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从那时起，我有幸成为戴砚田先生诸多“忘年交”中相知甚深的一个。

戴砚田先生与我通话的次日，即发来了他的散文选的目录。他说：“我的作品你都读过，你最熟悉。”此言不虚。先生的著作我都拜读过，至今它们都整齐地摆在我的书橱中，给我以艺术的滋养与思想的启迪。

戴砚田先生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从河北走向全国的第一代有成就的诗人，他与何理、刘章、浪波、申身被文坛同仁称为河北“诗坛五老”。作为一位优秀的编辑家，大半生都在从事“为人作嫁”工作的戴砚田先生并非十分高产的作家，但他的勤奋与执著，才情与赤诚，使他捉闲逮余地留下了诸多独具特色的瑰丽诗篇与锦绣文章，如高山般巍峨壮丽，似大海般丰富绚烂。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并没有遮掩其散文艺术的光彩，其灵动清新、温柔敦厚的诗笔，却为他的散文注入含蓄蕴藉、意蕴悠长的特色。像《岁久莲更香》的缠绵悱恻，《月亮赋》的清新雅丽，《我与大海》的深邃赤诚，《星光》的空灵纯净，以及《淀水思悠悠》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表现的人情人性之美，《我心中的雨花》展现的革命先烈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审美与教育价值兼具，经得起反复的咀嚼和岁月的淘洗。

戴砚田先生的散文，是心灵与自然有机契合的艺术佳构，从中可以感悟一代爱国知识分子丰富细腻的心路历程，领略新中国几代建设者纯洁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谛听时代的脉搏和生活的足音。对多彩生活的热爱与美好理想的追求，犹如一条红线，将他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连缀起来，成为一串熠熠生辉的五彩宝石。正如他在《戴砚田诗文选》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我爱山爱水，爱祖国的一草一木，爱每一位善良的人，爱和平安宁的生活。”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评王杏芬长篇报告文学《大漠游侠屈建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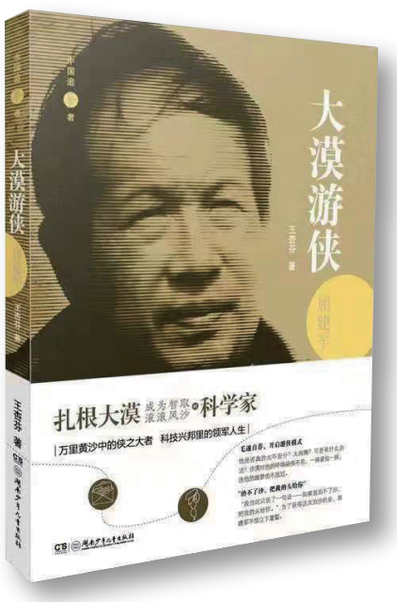
□吴广平 马 艳

王杏芬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漠游侠屈建军》是一部为治沙英雄屈建军书写的雄浑颂歌。全书12万字，由11章构成。作为少年儿童读物，作者以女性细腻温情的视角，以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笔调，记叙了治沙英雄屈建军扎根大漠近30年，成为智治风沙的科学家的故事。

长篇报告文学《大漠游侠屈建军》通过文学特有的方式生动地叙述了屈建军的成长之路。全书极少浓墨重彩的直接夸赞，而是让生活本身去说话，用朴实的生活细节去树立人物形象，去感染和征服读者。这样以小见大的细节在书中随处可见。

如第四章“不让莫高窟成为第二个楼兰”的第三节“迎着风跑的‘疯子’”中写道：每次刮风，吴老汉都会在自家的窗户边上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手捧一个奇怪的东西往鸣沙山上跑，好像在迎接风，又好像在与风说话，又好像在向风祈祷……他是迎着风跑的“疯子”，在他的眼里风是解开治沙奥秘的钥匙，很重要，好不容易来场风，不赶紧上山顶观测，风一过，一些重要的数据就无从下手，全身心投入到数据的记录中，全然不顾春天沙尘肆无忌惮地钻进耳朵、眼睛、鼻子和头发里面。但正是这个“疯子”治住了敦煌肆虐的风沙。又如，第九章“天路”的第二节“接受新任务”中写道：在青藏高原上征服天路的野外考察中，屈建军和他的学生们就着凉水、和着沙子啃馕成了常态。屈建军拿出一个塑料袋子，一个个发馕。馕又冷又硬，往往在嚼它的同时，沙也趁着空子钻进了口里。王杏芬这样描写，就将治沙英雄认真专注、敬职敬业、不怕苦不怕累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些细节描写都是作者从他人口中得知的，她并没有见到屈建军，直到全书结束时才见到，由于屈建军工作太忙只给了作者半个小时采访时间，“短短的半小时，他根本没有提及自己，自始至终用‘团队’两个字来提醒我”，他一再强调成绩是团队的，工作不是自他而始，更不会由他而终，它是有传承的。从“大侠”的口中，作者并没有获取到比旁人讲述更多的个人信息，但每个出场的人物口中的屈建军都是那么鲜活生动、立体丰满。在作者的笔下，这些描述就像一束光从四面八方汇聚、凝结起来，交织成一个光球，里面是一位不修边幅、胡子拉碴、戴着顶泛白的太阳帽，大口袋衣服皱皱巴巴，随身戴着“生化装备”人工呼吸机，随时准备迎着风跑的中年汉子，他就是大漠游侠——屈建军。



面对这样一位英雄人物，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创作角度和兴趣，有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法。作者王杏芬对此做了深入的思考，她通过记述、描写主人公的工作事迹、人物关系、思想感情、职业道德、言行举止，从而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担心敦煌莫高窟的露天壁画、洞窟围岩、洞内壁画和彩塑被风沙吹蚀和磨损，他成了迎着风跑的“疯子”；面对敦煌建城，月牙泉即将被埋，他据理力争“做科研要有良心，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说假话，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面对东南沿海某部海岸由于风沙活动强烈严重地侵袭了阵地而不得不搬迁的境遇，他立下治沙军令状，结果仅花了20万元节省了国家近2亿的搬迁成本；面对学生谢胜波在青藏高原出车祸，他心急如焚，彻夜无眠，他对待每个学生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作者质朴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屈建军丰富柔软的精神世界，看到了屈建军忘我奉献的思想基础。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例告诉我们，英雄并不是天生的，英雄的品格是一点一滴的汇聚而成的。

作者王杏芬去采访屈建军，屈建军却带她去采访了杨根生。杨根生是中国最早研究沙尘暴的科学家之一，中国首部研究沙尘暴的专著《黑风暴》就出自他手。在第十一章“致敬！杨根生”中作者刻画了表面温情诙谐实则心酸无奈的一幕：

杨根生蹲下来，搂着孩子的腰：“想吃吗？”

孩子吞了一口口水，点点头。“只要你喊我爸爸，你喜欢吃啥我给你买啥！”

孩子睁着大黑眼珠子瞪着他，许久才说：“行！但在有人时我就不喊。”

“行！”杨根生不停点头，忙不迭掏出钞票付账。大儿子左手端着零食，右手一个劲往嘴巴里塞着吃的。他蹦蹦跳跳在杨根生的身边，走不多远喊声“爸爸”，走不多远又喊声“爸爸”，稚嫩的童声喊得杨根生心里美开了花。

作者以女性细腻温情的视角，相继描写了屈建军的儿子怨恨父亲、杨根生的儿子不认父亲的心酸场景，因为他们都是大漠英雄，常年扎根大漠，舍小家为大家，不得已与家人聚少离多。这样具体生活琐事的描写，就让读者看到了感人的温情一幕。

屈建军最佩服鲁迅，因为鲁迅做人有铮铮傲骨，却又能为百姓“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还佩服钱学森、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身上的精神，胸怀天下心系国家。屈建军的微信昵称为“戈壁砾”，QQ个性签名是：“我望不到山顶，只知道有山顶，然而我还是要攀登。”他对“90后”王彦奎说：“这个世上为自己的人很多，为大家的人很少，为更大的大家的人更少。”“人来一趟世间不容易，总要做点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才不致遗憾。”屈建军经常这样告诫他的学生，同时，他自己也是坚定的践行者。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屈建军用自己的脚步和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屈建军的外号是“大漠游侠”，这个“侠”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